

# 权力论

新社会分析

〔英〕伯特兰·罗素 著

商务印书馆

B11.

Do/3/13

# 权 力 论

## 新 社 会 分 析

〔英〕伯特兰·罗素 著

吴友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1年·北京

*Bertrand Russell*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  
The Norton Library, 1969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根据纽约 W. W. 诺顿公司  
诺顿丛书 1969 年版译出

内部发行  
QUÁN LÌ LÙN

权 力 论

新社会分析

【英】伯特兰·罗素 著

吴友三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619-8/D·39

---

1991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70 千

印数 0-7 000 册

印张 7 1/4

定价：2.65 元

## 出版说明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是二十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 1872年5月18日生于英格兰蒙默思郡特雷莱克。由于年幼丧失双亲, 他从小依靠祖父母抚养长大。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间, 他的祖父曾两次担任首相。罗素从小在家里接受教育, 由外籍保姆和家庭教师教他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 他哥哥教他数学, 他叔叔教他其他科目, 而他自己也很好学, 大量阅读历史和文学著作。通过这些学习, 使他在外语、数学、历史、文学等各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90年, 他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攻读数学和哲学。毕业时, 他成绩优良, 决心仿效黑格尔献身于哲学研究。

但是, 罗素的兴趣很广, 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并没有限于哲学, 而是涉及到数学、物理学、历史、政治、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1895年, 他到德国旅行, 在柏林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 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的活动, 结识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他在德国还学习康托的著作和德国数学, 重新认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数学, 从而使他放弃了绝对唯心主义, 转向实在论的哲学立场。同年, 他由于写成数学论文《论几何学基础》而取得剑桥大学研究员的资格, 并参加了费边社。1908年, 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11年被选为亚里士多德学会会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残酷的战争使罗素转向和平主义的

立场。他积极进行反战宣传,倡导和平,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伦敦组织“拒服兵役委员会”,由于这个缘故,他在1916年受到控告和罚款,并被三一学院解职。但是他没有因此而退却,而是进一步投身于政治活动。1920年春,他随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访问苏维埃俄国,受到列宁的接见,回国后写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一书,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同年秋天,他到中国访问,在北京大学讲授“物的分析”、“心的分析”等哲学问题,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赴美讲学,战争结束时返英,1949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荣誉院士。五十年代中期,他与爱因斯坦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禁止核武器,后来又组织核裁军运动。在越南战争期间,他反对美国侵略越南。1968年,他抗议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2月2日,这位当代的哲学巨匠、热诚的和平主义者与世长辞。

罗素是一位博学多才的高产作家,他一生中发表了71部著作,他发表的论文和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些著作中,主要有《表象与实在》(1893)、《德国社会民主主义》(1895)、《数学原理》(1910)、《我们对外界的认识——哲学中的科学方法》(1914)、《社会改造原理》(1916)、《心的分析》(1921)、《工业文明的前途》(1923,与其夫人布莱克合著)、《婚姻与道德》(1929)、《幸福之路》(1930)、《教育和社会秩序》(1932)、《自由与组织,1814—1914》(1934)、《权力论》(1938)、《意义与真理的探究》(1940)、《西方哲学史》(1945)、《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限度》(1948)、《我的哲学的发展》(1959)等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著作。在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还发表了《郊外的撒旦》(1953)和《伟大人物的梦魇》(1954)两部文学作品。

《权力论》是罗素的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发表于1938年。当时

欧洲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希特勒跃跃欲试，气焰十分嚣张。在这危急情势下，罗素对战争极为担忧。他从和平主义立场出发，一面积极支持英国政府的绥靖政策，一面撰写本书，提出如何节制权力，企图以此来提醒法西斯战争狂人和各国的统治者，避免战争的发生。这就是他写作本书的目的。

在本书中，罗素一开始就提出权力欲问题，认为它是人的主要欲望，是社会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据此，他把权力问题提到了一个不适当的高度，认为“权力”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犹如“能”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一样。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证了古往今来的大量资料，逐一论述了教权、王权、革命权力、经济权力、支配舆论的权力等各种权力的形态，以及权力与政体、权力与道德、权力与组织和个人的关系。通过这些论述，他所得出的结论是：人对经济的需求是有限度的，是可以得到满足的，然而人对权力的追求则是无度的，永远不会满足的。正是这种人对权力的无止境的追求，造成了难以数计的多种社会弊端。因此他提出要把探索权力欲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作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以便找出节制权力的有效方法，从而使个人、组织和政府节制对权力的追求。他认为只有切实节制权力，才能真正实行民主制度，防止战争发生，使人人得到自由和平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罗素就权力问题和如何节制权力发表专著，无疑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同时必须看到，权力毕竟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它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对于这一点，罗素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述，这是书中的一大不足。而且，他仅仅提出如何节制权力，而回避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那么这种节制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也是不难想象的。此外，罗素和其他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在书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了颇不确切的对比或解释，说什么

民主主义只讲政治，马克思主义只讲经济，把共产党同法西斯党、纳粹党相提并论，把列宁和斯大林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对比，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说成党的专政和个人专政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望读者加以注意。

1987年6月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权力欲的冲动    | 1   |
| 第二章   | 领袖和追随者    | 7   |
| 第三章   | 权力的形态     | 23  |
| 第四章   | 教权        | 34  |
| 第五章   | 王权        | 52  |
| 第六章   | 暴力        | 59  |
| 第七章   | 革命的权力     | 76  |
| 第八章   | 经济权力      | 86  |
| 第九章   | 支配舆论的权力   | 97  |
| 第十章   | 作为权力来源的信条 | 103 |
| 第十一章  | 组织的生物学    | 112 |
| 第十二章  | 权力和政体     | 127 |
| 第十三章  | 组织和个人     | 144 |
| 第十四章  | 竞争        | 151 |
| 第十五章  | 权力和道德准则   | 161 |
| 第十六章  | 权力哲学      | 180 |
| 第十七章  | 关于权力的伦理学  | 187 |
| 第十八章  | 对权力的节制    | 195 |
| 译名对照表 |           | 219 |

## 第一章 权力欲的冲动

人与其他动物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有智力方面的区别,有感情方面的区别。属于感情方面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人类的某些欲望跟动物的欲望不同,是根本无止境的,是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蟒蛇吃了就睡,直到食欲再起。如果别的动物不是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它们的食料不够充足,或是因为它们惧怕仇敌。动物的各种活动,是由生存与生殖两个基本需要所引起的,而且也不出乎这两个需要所迫切要求的范围。这一点很少例外。

至于人,情形就不同了。固然,大部分人为了取得生活必需品而被迫辛勤工作,很少有余力追求其他目的;但生活有保证的人,却并不因此而停止活动。薛西斯<sup>①</sup>远征希腊的时候,并非缺吃少穿没有妻妾。牛顿自从当上了三一学院的校务委员时起,物质享受就有了保证,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撰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圣芳济<sup>②</sup>和罗耀拉<sup>③</sup>也不是为了摆脱贫困才需要创建教派的。这些都是著名的人物,但同样的特性也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出现在一切人的身上,只有少数异常懒散的人是例外。某甲的妻子深信丈夫在事业上会取得成功,不愁流落到贫民习艺所里去,可是她喜欢穿得比某乙的妻子漂亮,虽然用不着花那么多钱就能预防肺炎了。如果某甲能受封为爵士或当选为议员,她和丈夫就会格

---

① 薛西斯(公元前约 519—前465),波斯皇帝,曾于公元前 480 年率大军远征希腊,失败而归。——译者

② 圣芳济(1182—1226),意大利教士,基督教圣芳济会创始人。——译者

③ 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教士,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译者

外高兴。想象中的胜利是无穷无尽的。假如这些胜利被认为可能实现的话，人们就会作出努力去实现它们。

想象是驱使人们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再继续奋斗的一种力量。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有机会能这样说：

“要是我现在死去，那才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怕我的灵魂已经尝到了无上的欢乐，此生此世，再也不会同样令人欣喜的事了。”<sup>①</sup>

当我们处于难得的十足幸福的境界时，很自然地会像奥瑟罗<sup>②</sup>一样，希望死去，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满足是不能持久的。能使我们的幸福持久的东西，在人类是不可能有的；只有上帝才能有全福，因为“国度、权柄、荣耀”<sup>③</sup>全是他的。世间的王国要受其他王国的限制；世间的权力要被死亡打断；世间的荣誉，纵使我们建筑了金字塔或“与不朽的诗歌匹配良缘”<sup>④</sup>，也将随时代的变迁而衰失。在权力与荣誉都很微小的人看来，似乎只要再多一点权力和荣誉就会使他们满足，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了，因为这些欲望是无厌的、无限的，只有在上帝的无限之中，才能休止。

动物只要能够生存和生殖就感到满足，而人类还希望扩展。在这方面，人们的欲望仅限于想象力所认为可能实现的范围。假如可能的话，人人都想成为上帝；少数人还不容易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犹如弥尔顿作品中撒旦那种人物<sup>⑤</sup>，兼有正邪双重性格。所谓“邪”，我的意思是指不依托于宗教信仰的性格，也就是拒不承认个人权力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正与邪的伟大结合，在

① 《奥瑟罗》第2幕，第一场。——译者

② 奥瑟罗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瑟罗》中的主人公，曾堕奸人之计，疑妻不贞，将她杀死，后发现妻子无辜，因亦自杀而死。——译者

③ 基督教圣经中的《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13节。——译者

④ 英国大诗人弥尔顿(1608—1674)所著《快乐的人》I. 127。——译者

⑤ 弥尔顿在其《失乐园》一诗中，叙述撒旦如何背叛上帝，以及如何诱惑夏娃取食上帝的禁果，致使亚当与夏娃被上帝逐出乐园。——译者

伟大征服者的身上最为明显，但其中有些因素也可以在一切人的身上发现。正是由于这种情形，社会合作不易实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把社会合作看成是上帝和信徒之间的那样的合作，而以上帝自居。因此就产生了竞争，需要妥协与统治，产生了反抗的冲动以及随之而生的动荡不安和某一时期的暴力行为。因此就需要道德来对目无政府、坚持自己权利的人加以抑制。

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两者虽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同：英国首相的权力多于荣誉，而英王的荣誉则多于权力。但是，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就公共事业的活动家而言，情形更是如此。大体说来，荣誉欲所导致的行动与权力欲所导致的相同，因此在最实际的意义这两个动机可以看成是一个。

正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上的利己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视为基本的动机。马克思也同此见解。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了。当追求商品的欲望离开了权力与荣誉两种欲望的时候，这种欲望也就有限得很了，只需适当数量的财富就能完全使它满足。真正所费不赀的欲望并非来自对物质享受的爱好。有这样一些商品，例如用贿赂收买来的立法机关，或陈列着专家精选的画坛大师作品的私人画廊——这类“商品”之所以为人所追求，是为了权力和荣誉，而不是为了里面有设置舒适供人憩息的场所。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但不论是前一种情形还是后一种情形，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是经济上的动机。

正统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犯的这种错误，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有极大的实际意义，并且使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遭到误解。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

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

在本书中,我打算证明: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权力也和能一样,具有许多形态,例如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在这些形态当中,没有一种能被认为是从属于其他任何一种的,也没有一种形态是派生所有其他形态的根源。孤立地研究某一种形态的权力(例如财富),只能获得局部的成功,正如单研究一种形态的能,在某些方面是会有缺陷的,除非也兼顾到其他的形态。财富可以从军权中产生出来,也可以从影响舆论的势力中产生出来,正如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也可以从财富中产生出来一样。社会动力学的规律,是我们只能用权力而不能用这一种或那一种形态的权力来说明的规律。从前,军事权力被看成是孤立的,因此战争的胜败好像只是决定于将领们的意想不到的本领。如今,经济权力通常被看成是派生其他一切权力的根源;这个错误,我认为与那些单纯的军事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同样巨大;单纯的军事历史家所犯的 error,已使他们似乎落在时代的后面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宣传是权力的根本形态。这个意见毫不新颖,例如在“真理伟大、必胜”<sup>①</sup>以及“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sup>②</sup>等等传统的名言中,就已体现了这种见解。这种见解和前面所说的纯军事观点或纯经济观点,具有等量的真理,也具有等量的谬误。假如宣传能形成一个近乎一致的意见,那么,宣传诚然可以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但是握有军事或经济权力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把他们的权力使用在宣传方面。再用物理学来做一个比喻:权力和能一样,必须被看作是不不断地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而求出这种转变的规律,应该

① 托马斯·布鲁克斯(1608—1680)语,见所著《基督教的冠冕与荣光》(1662)。——译者

② 德尔图良(约160—约225)语,见所著《护教篇》。余见本书第158页译者注③。——译者

是社会科学的任务。想把任何一种形态的权力——如今特别是经济权力这一形态——孤立起来的企图，一向是而且仍然是许多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错误的根源。

就权力而言，不同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是有区别的。首先，在个人或组织所享有的权力的程度上，各社会是不同的。例如由于组织的增强，今天国家的权力显然比以前要大。其次，就何种组织最占势力这一点来说，各社会也是不同的：军事专制国家、神权国家、财阀统治的国家都是很不相同的类型。第三，在获取权力所用的方法上，各社会也是不同的：世袭的王权产生一种显要的人物，高级教士所须具备的各种条件又产生另一种显要人物，民主政治产生第三种，战争又产生第四种。

假使有可能获得权力的人，在人数上不受社会制度（例如贵族制或世袭的君主制）的限制，那么，一般说来，凡是最希望获得权力的人，就最有可能获得权力。由此可以推论，在权力向大家开放的那种社会里，凡是能予人以权力的职位，照例是被爱好权力异乎常人的人所占有。对权力的爱好虽然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之一，但表现在各人身上的程度却很不一致，而且也与其他动机所限制，例如爱安逸、爱享乐以及有时爱表扬等。在比较怯懦的人当中，对权力的爱好伪装为对领袖服从的动力，这就扩大了大胆之徒发展权力欲的余地。对权力的爱好不甚强烈的人，是不可能对世事的演进产生多大影响的；引起社会变革的，通常就是极希望引起社会变革的那些人。因此，爱好权力是在世事的造因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那些人的一种特性。当然，假如我们把爱好权力当作人类唯一的动机，那也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还不致象我们在探求社会科学的因果律方面所容易造成的错误那样使我们完全迷失方向，因为爱好权力是产生社会科学所必须研究的那些社会变革的主要动机。

社会动力学的规律——我主张——只能用权力来加以说明。为了发现这些规律，首先要把各种形态的权力进行分类，然后回顾历史上个人和组织如何获取权力以支配人们生活的重要事例。

我将始终抱着这样的双重目的：一是对一般的社会变革提出我认为比经济学家所讲授的更为恰当的分析意见；另一是使现在和可能的不久的将来更容易理解，使其可理解的程度高于想象力受十八、十九两世纪支配的人所能理解的程度。那两个世纪在许多方面有它们的独特之处，而我们现在似乎在好多地方正在恢复更早时期所流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和它的需要，就必须理解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历史，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并不过分受十九世纪原则支配的可能的进步。

## 第二章 领袖和追随者

权力欲的冲动有两种形态：在领袖的身上是明显的；在追随领袖的人身上是隐含的。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一个领袖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来获得权力；他们感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大多数人觉得自身没有能力把他们的集团导向胜利，于是就想获得一个智勇兼备足以成就丰功伟业的首脑。即使在宗教方面，这种权力欲的冲动也是存在的。尼采谴责基督教宣扬奴性的道德，但目的总是获取最后的胜利。“温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承受世界。”<sup>①</sup> 有一首著名的赞美诗更加清楚地说明：

为了获取王冠，  
基督出发征战。  
他的鲜红的旗帜卷向远方。  
谁追随在他的后面？  
谁最能克服苦痛，  
体验他的忧患，  
谁耐心地背着他的十字架，  
谁就追随在他的后面。<sup>②</sup>

如果这是奴性的道德，那么，每一个在战争中饱受严酷锻炼的雇佣军人，或每一个在选举中竭力活动的一般政客，都可以算是

---

① 《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译者

② 英国主教、著名赞美诗作家雷金纳德·希伯(1783—1826)所著赞美诗。——译者

奴隶了。但事实上,在每一种真正的合作事业中,追随者在心理上并不比领袖有更多的奴性。

正因如此,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才能为人们所忍受。这些现象之不可避免,是组织工作所造成的,而且,社会越是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这些现象就只会越来越多,不会减少。

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间是存在的,这可以追溯到我们了解所及的远古时代。这部分是由于客观的需要,部分是由于人类本性中的某些因素。大多数的集体事业,只有在某种管理机构的指导下才有实现的可能。要盖一所房屋,就要有人在设计方面作出决定;要在铁路上行驶火车,行车的时刻表就不能由司机去随意制订;要建筑一条新的公路,就要有人决定它的路线。即使是一个用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也毕竟是一个政府,因此,根据与心理无关的理由,集体事业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命令。可是,为什么这是可能的呢?特别是为什么实际的权力不均现象超过了根据法律而成立的原因所必然造成的不均现象呢?这些事实只能从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方面求得解释。有些人的性格促使他们总是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的性格则促使他们总是服从。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广大的普通人,他们在某种情形下乐于发号施令,在另一种情形下又宁愿服从领袖。

阿德勒<sup>①</sup>在《理解人性》一书中,分辨出温顺的人性和专横的人性两种类型。他说:“屈从的人按照别人所订的规则和法律生活,这种人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想要获得卑屈的地位。”他又说,与此相反,属于专横一类的人总是要问:“我怎样才能比其他任何人都优越?”每逢需要一个领导者的时候,这种人就出现了,而且在革命

---

①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译者

当中上升到很高的地位。阿德勒认为这两种类型至少在其极端情况下都是要不得的；他认为这两者都是教育的结果。他说：“命令式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对儿童起了权力的示范作用；而且向他们显示了各种与享有权力有关的快乐。”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种教育不但产生专横类型的人，而且产生奴隶类型的人，因为它使人感到，在实行合作的两个人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是一个人发号施令而另一个人服从命令的关系。

有限度地爱好权力，是几乎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绝对的爱好却是罕见的。一个享有管理家务权力的主妇可能不愿接受一个首相所享有的那种政治权力；反之，亚伯拉罕·林肯虽然不惮处理美国的国家大事，却不能应付家庭中的争执。假如“贝勒罗芬”号军舰<sup>①</sup>遇了险，拿破仑也许会乖乖地听从从英国军官的命令，乘坐小艇逃生。人们只要自信能处理当前的事务，就会喜爱权力，但他们一旦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就宁愿服从领袖了。

使人服从的动力与使人发号施令的动力同样真实而普遍存在，它根源于恐惧。在危急的关头，例如在失火的时候，最顽劣的儿童也会完全服从一个有能力的成年人的命令。大战<sup>②</sup>爆发时，潘克赫斯特派<sup>③</sup>和劳埃德-乔治<sup>④</sup>达成了和解。在任何存有深刻危机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迫切愿望就是要找出一个权威人士而向他服从。在这样的时候，很少人会想到革命。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人民对政府也怀有和这类似的感情。

---

① “贝勒罗芬”号为英国皇家舰艇。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登此舰投降。——译者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下同。——译者

③ 潘克赫斯特是英国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领袖。所用的方法是在议会中阻碍议事的进行和街头示威。1908年被捕，以绝食抗议。——译者

④ 戴维·劳合-乔治(1863—1945)于1916至1922年任英国首相。——译者